

# 審訊公平性豈在於有無外國大狀？

銳評

徐清

昨日高院判決律政司上訴敗訴，黎智英提出的「專案認許」獲批准，可以聘請英國大狀進行辯護。法庭判決自有其理據，筆者謹表示尊重，但卻不能認同。事實上，法庭兩次判決的理據：一是本案審訊涉及艱澀複雜議題，外來大狀有助法庭審訊；二是本案關乎審訊公平性，允許外國大狀參與是保障公眾利益。這兩點是站不住腳的。審訊的公平性，不在於聘請什麼樣的律師，更不在於是否聘用海外大律師；而本案所涉及的法律原則十分清晰，並不存在所謂的「艱澀」問題，刻意對「本地」和「海外」大狀進行區別，難免令人有「分化」的觀感，這對香港本地法律界發展沒有任何好處。

黎智英被控串謀發表煽動刊物及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共4罪，據公開報道，控方針對黎的主要指控在於，一是黎智英透過《蘋果日報》或其個人身份，發表及翻印煽動刊物，並串謀或請求外國勢力制裁香港

特區及中央政府，危害國家安全；二是指黎智英參與指導及資助「重光團隊」。本案原定於11月開審，但黎智英早前提出「專案認許」申請，欲聘請英國御用大律師Tim Owen來港為其抗辯。律政司反對。其後經過初審及上訴，律政司兩次都遭判敗訴。

就法庭的第一個理據，例如高院首席法官潘兆初表示，考慮審訊牽涉「尤其艱澀、複雜」的法律議題；昨日三名法官表示，有傑出的法律專家參與審訊，對剛制定不久的香港國安法的法理發展有着重要影響。這些理據，很難令人認同。

## 海外大狀更懂香港國安法？

首先，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已兩年多，已有多宗判例，包括「唐英傑案」，如果國安法真的如此「艱澀、複雜」，當時為何無人提出相關申請？再者，香港國安法的唯一官方語言是中文，英文版本僅是提供參考，而且香港國安法下的國家安全概念，與中央政府及香港的社會、政治環境及「一國兩制」下的憲制秩序等原則息息

相關。試問，香港本地如此多資深大律師，在此方面的理解，會不如沒有在香港生活過的海外大律師更透徹？其情形好比，英國本地法院進行國家安全案件審訊，有人卻認為來自香港的大狀更能理解英國法律，這是否合理呢？

正如律政司早前所指出，考慮到Tim Owen的專長並非香港國安法，他亦不是本地法律下涉及危害國安罪行的專家，因此他不能為法庭帶來獨特的審視角度，何況本案中，已有具相關經驗的資深大律師參與。律政司認為原審法官在批出許可時，忽略了這些要素。

就法庭的第二個理據，例如昨日三名上訴庭法官在判詞中指出，本案是引人注目的案件，為了秉行公義，審訊必須讓公眾覺得是公平進行的。綜合上述理由，上訴庭認為批出許可，讓Tim Owen出庭為黎智英抗辯是符合公眾利益。這一結論，似乎刻意將「海外」和「本地」大律師進行區別對待，這不僅對本地大律師不公平，也是曲解了「審訊公平性」。

首先要指出的一點是，黎智英所提出

的「專案認許」本身就非「尋常」做法，早前香港大律師公會已清晰表明了反對黎智英聘請英國御用大律師來港一事。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杜淦堃早前回覆傳媒時表示，有關申請不符合海外大律師來港接案的一貫標準，公會將向法院陳述反對理據。連大律師公會都認為「不符一貫標準」，試問，批准黎的申請，這又是否「審訊公平性」的應有體現呢？

## 本地大狀不能透徹理解法律？

再者，審訊是否公平的關鍵，在於沒有任何人能凌駕於法律，且整個審訊程序嚴格按照法治標準進行，而不在於是否有海外大狀的參與。聘請外國大律師未必會促進公平審訊，聘請本地大律師也不會減損公平審訊。

更不能忽視的是，本案本身具有很強的香港本地元素，且主要涉及基本法、香港國安法所規定的基本權利，以及香港本地刑法等，沒有理由強行以確保「審訊公平性」為由去強行引入海外大狀。香港有足夠的有能力的法律專才處理本案，香港

的大律師處理本案同樣能夠促進法律發展和維護公眾利益。

正如有本地法律界人士指出，昨日的判決結果對香港法治和整個法律界來說，並非一個積極正面的信息，有人或許會理解為，香港司法界缺乏具備普通法視野和了解其他普通法地區關於國家安全情況的大律師去處理國安法案件，亦讓人感到司法機構認為香港司法界無能力處理相關案件，構成不好觀感。

截至2022年11月8日，香港共有1527名認可大律師，103名資深大律師，有人竟然認為香港沒有人對國安法及基本法的理解比得上外國大律師，這是否能令人信服？更重要的是，審訊公平公正，不能看「國籍」，更不能看「居住地」。或許，公眾更憂慮之處在於，海外大狀會否將原本清晰明了的法律，弄得「艱澀、複雜」？律政司應考慮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

# 結合二十大報告談香港高度自治權的行使

學者論衡

常樂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指出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的重要性，今年以來又相繼在「七一」重要講話和二十大報告中突出強調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的重要意義。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七一」重要講話和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兩次強調指出了「堅持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這是在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之際習近平提出的關係「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重大規律性認識，是新階段中央治港方略的新觀點、新論斷和新發展，也是指導「一國兩制」香港實踐行穩致遠的根本遵循。這裏側重從香港特區高度自治權的行使問題談一點學習體會。

## 一、兩權的不同位階決定了中央全面管治權涵蓋特區高度自治權

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關係的本質是由「一國」和「兩制」關係的本質決定的。因此處理好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關係的前提和關鍵，就是把握好「一國」和「兩制」的關係。「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兩制」從屬和派生於「一國」。沒有「一國」這個前提，「兩制」就無從談起。在此基礎上，特區高度自治權來源於中央的授權，特區高度自治權除中央授權外，並無其他任何剩餘權力。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由此亦可說，遵守和維護中央全面管治權是特區高度自治權的恪守與本分。只有在牢牢維護「一國」原則和中央全面管治權的前提下，香港才能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長期不變，才能享有高度自治權。「一國」原則愈堅固，「兩制」優勢愈彰顯，特區高度自治權愈充分。

## 二、兩權相統一 是上下位序的銜接與統一而非齊頭並行的配合式統一

香港基本法第十二條規定了两點重要內容：一是強調了香港特區擁有高度自治權，突出了香港地區及其治理的特色；二是強調

了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突出了香港特區政府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政府角色。正如前文所述，這二者是高度統一起的，但是也充分表明了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上下位階關係，以及中央人民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的領導與被領導關係。

根據國家需要，依據憲法規定，黨和國家創立了「一國兩制」方針和特別行政區制度，因此特別行政區一方面要接受國家的領導，另一方面也要服從服務於國家的根本制度和國家發展大局的需要。這一過程，就是特區的管治過程，就是中央全面管治權領導監督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過程，是一個上下一心力量統一的過程。

根據香港基本法的規定，中央直接行使外交權和防務權，香港特區在行政、立法、司法等領域享有高度自治權。但是香港基本法也同樣規定，香港特區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的高度並非沒有邊界，而都受到相關中央機構的規管。基本法條文中的這些規定，充分體現了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上下位序的領導被領導關係。

中央全面管治權在特區的行使主要是通過法律來實現的。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穩定的治理，要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進行治理。中央依法治港，是全面依法治國的應有之義，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必由之路。

## 三、香港特區高度自治權的獨立性行使問題

我們還要看到，一方面，中央政府對特別行政區擁有全面管治權，這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的源頭；另一方面，中央充分尊重和堅定維護特別行政區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也就是說，特區高度自治權雖然來自於中央的授權，但是特區在行使其高度自治權時還是具有明確的相對獨立的地位。這一地位，是由憲法和基本法決定的，也是「一國兩制」方針的題中之義，中央予以充分尊重和法律保障。也正正是因為二者之間的這種緊密關係，中央全面管治權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特別行政區依法行使高度自治權來實現

的，並通過這一方式來體現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的關係。

首先，香港特區所實行的不同於內地的資本主義制度，是其高度自治權獨立性行使的主要原因。香港基本法序言和總則的第五條都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對於實行異質性制度的地區而言，相對獨立地行使其治理模式，既是制度要求，也在情理之中。可以說也是考慮到這一因素，在這次二十大報告中，又再一次強調了「保持香港、澳門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長期不變」這一特區基本制度特點。

其次，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雙代表雙負責」的制度特點，是其高度自治權獨立性行使的重要原因。這種特區行政長官「雙代表雙負責」的制度特點，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特區高度自治權的相對獨立性地位。正是在這種法律和政治意義上，習近平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指出，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是香港的當家人，也是治理香港的第一責任人。這句話就更加形象地揭示了特區高度自治權的自我施展空間。

最後，香港長期形成的獨特地位和優勢，也是其高度自治權獨立性行使的自然結果並且需要繼續保持和發揚。為此，中央政府完全支持香港長期保持獨特地位和優勢，鞏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維護自由開放規範的營商環境，保持普通法制度，拓展暢通邊界的國際聯繫。

另外，當前香港正處在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未來五年是香港開創新局面、實現新飛躍的關鍵期。治理好、建設好、發展好香港特區，一方面要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的統一銜接，另一方面也離不開特區政府行使好其高度自治權。而特區政府高度自治權的行使，一定程度上還受到其治理水平的影響。因此，完善治理體系、提高治理能力、增強治理效能，是當前特區政府行使好其高度自治權的題中之義，也是其必須圓滿完成的答卷。

## 暨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研究員

一連三日的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圓滿結束，超過200名來自全球約120家金融機構的國際和地區負責人參與峰會，數十名業界翹楚在峰會上分享他們的獨到觀點，不但有助各界一同應對全球經濟、金融、科技及地緣政治的變化，亦能從中掌握當前環境下做好風險管理和把握機遇。筆者對此深感鼓舞。峰會將成為香港穩步復常的標誌，隨世界各地往來日漸恢復，相信會有更多國際盛事將選擇在香港舉行。

疫情導致各行各業步入嚴冬，全球經濟下行，利率上升、滯脹風險亦為市場帶來不確定性，香港經濟陷入低潮。筆者認為在前景不明朗的環境下，舉辦是次峰會有助各界做好部署，而香港應當用好「背靠祖國、聯通世界」這得天獨厚的顯著優勢，逐步推動社會復常，重振經濟。

祖國永遠是香港的最堅強後盾，近年國家經濟實力穩步上揚，2021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14萬億元，佔全球經濟的比重由2012年的11.4%上升至18%以上，穩定提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全社會研發投入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亦由2012年的1.91%提至2021年的2.44%；全球創新指數排名由第34位上升至第12位。種種數據顯示，雖然香港經濟目前面對一些不確定因素，短期內難言樂觀，但在「背靠祖國」的優勢下，社會各界毋須過分憂慮。

香港在共建「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中，一直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作用，擔當祖國與沿線國家之間的「超級聯繫人」。十年來，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碩果纍纍，不但加強了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更促進了各國友好關係，一舉兩得。筆者認為是次峰會將是持續深化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契機，因為不少「一帶一路」項目需要吸引世界各地的金融機構參與融資，而是次峰會正正匯集世界各地的金融業界翹楚，絕對有能力、有條件促成更多合作。

為了有效推動香港參與共建「一帶一路」，筆者日前在立法會向特區政府提出質詢，促請特區政府盡快打造「一帶一路」綜合服務平台，做好相關配套政策和措施，以便利境外金融機構和投資者來港參與「一帶一路」項目融資。特區政府的回應正面，表示於基建項目融資、離岸人民幣業務、資產管理和跨國企業財資中心、綠色和可持續金融、會計服務等多方面均落實了不少舉措，並強調會善用香港金融和專業服務的優勢。筆者對此充滿期待，期望特區政府能夠確切落實和執行相關措施，推進香港深度參與共建「一帶一路」。

社會復常是香港經濟復甦的關鍵之一，持續近三年的疫情導致世界各地的往來大減，影響經濟，然而 是次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的成功舉辦，正是香港復常的第一步。財政司司長指出，峰會成功向世界展示香港開放和復常，明年將繼續舉行。事實上，香港將會陸續舉辦更多的國際盛事，例如近日成功舉辦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意味著香港具備了復常條件。筆者期望特區政府及早為復常做好準備，推動香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及加強與世界各地的聯繫，繼而推動香港經濟逐步復甦。

新民黨副主席、立法會議員、執業大律師

# 香港須在極不確定世界中把握兩大確定性



知微篇
 周八駿

中共二十大報告中關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演變，包含這樣兩句話——「世界進入新的動盪變革期」「來自外部的打壓遏制隨時可能升級」。

二十大後，中國接待第一位外國領導人是越南共產黨總書記阮富仲。在《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深化中越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簡稱中越聯合聲明）中，雙方關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判斷是——「世界局勢正在經歷深刻複雜、難以預料的歷史性巨變，進入新的動盪變革期。」

就中國而言，「來自外部的打壓遏制隨時可能升級」，主要是指來自美國的打壓遏制將不斷升級，這是可以確定的；但是，美方何時升級則極不確定，必須準備

隨時可能發生。

就中越而言，共同面對歷史性巨變難以預料，亦即世界局勢極不確定。因此，中越進一步加強和深化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 應對歷史巨變的兩大保障

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既同國家一起面對主要來自美國的打壓遏制隨時可能升級，又面對整個世界進入難以預料的歷史性巨變。換言之，美國對中國包括香港的打壓遏制，是中國包括香港當前和今後幾十年必須應對的主要挑戰，同時，中國包括香港還必須應對難以預料的歷史性巨變的其他挑戰，譬如，越益惡化的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減失。

中共二十大成功舉行，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為中華民族應對極不確定、難以預料的世界局勢歷史性巨變提供兩大保障，一是更加穩固堅強的政治領導、路

線指引和各項方針政策部署，二是經濟持續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

不能以過往40多年中國年均GDP實際增長率來判斷中國經濟趨勢。隨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愈益深化愈益拓展，經濟全球化必定遭遇時間不短的逆流，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必定陷入時間不短的斷裂和重組，中國經濟難以避免同全球經濟一起下行。但是，中國構建新發展格局，確保糧食、能源和主要原材料的供應，把經濟民生的根基牢牢扎在自己的國土上，就一定能夠比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能保持經濟穩定增長。

美西方媒體關於中共二十大的評論，既不脫所謂「民主對抗威權」之窠臼而加以抹黑，又無法掩飾對中國政治領導穩固之忌憚而暗嘆不如。放眼全球，具相當能力者凡認真研讀了中共二十大報告，不論其政治立場和觀點，都不能不承認，難以找出另一個國家的政治領導，能如中國般

對世界局勢、國家命運作出十分清醒十分客觀十分全面的分析判斷，能如中國般為國家民族前途制定中長期切實可行的路線圖和實施方案。

香港居民應當為自己是中華民族成員而慶幸。然而，不能不指出，一些深受美西方影響的人士，至今沒有把自己的命運同香港緊緊一起，至今沒有視香港與國家共命運。

## 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至今沒有把他們自己的命運同香港緊緊一起，是因為這些人沒有真正視香港為家。至今沒有視香港與國家共命運，則是因為這些人錯誤將香港視為是中國土地上的一塊「飛地」（enclave）、同美西方保持着緊密聯繫。

從主權屬性看，香港即使在港英管治時期也不是一塊獨立於中國的「飛地」，遑論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後。香

港同國家以及香港同美西方的聯繫，經歷了重大變化。回歸前，在經濟政治上上長期與美西方密切聯繫。回歸後，經濟與內地一體化，政治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尤其出台實施香港國安法、全面貫徹「愛國者治港」原則以來，香港與美西方在政治上拉開距離。二十大確定香港長期保持資本主義制度，同時要求香港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保持獨特優勢不是也不可能代表香港作為國家的一塊「飛地」。

香港金融管理局早前舉辦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邀請全球約120家金融機構的約250位國際及地區負責人，共商全球變局下的金融市場穩定與發展，邀請中央金融監管部門負責人介紹中國金融進一步改革開放發展。這一盛事，展現特區政府和香港金融經濟界把握兩大確定性——依靠國家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積極應對極不確定的世界局勢。

資深評論員、博士